

## 《太平年》里的历史痕迹

□桑克

天鹄  
副刊

最近,关于五代十国的历史剧《太平年》正在热播。从选材以及对历史感的把控来看,这类戏比较少见,故而引起众人的兴趣。我就是其中一个。

五代十国是乱世,如同南北朝,所以不论对影视剧还是历史学者来说都是一个既严肃又有难度的课题。不少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到了具体情境之中也会被质疑。这便是做学问的开始,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我就在“知其然”的锅边上打个转儿吧。

忍不住拿剧情与历史比较。这是毛病,因为剧集虚构天经地义,比如剧中孙太真家族的黄龙岛或者黄龙社,历史上并不存在,但是观众喜欢这种江湖力量对朝堂体制的制约,喜欢孙太真和钱弘微的感情往来,编剧也便化巧思于其中。当然,编剧更喜欢虚构的穿插之功与转圜之能,以便历史有所附会。画龙有影,编剧所谓也非信口而来,真正的黄龙岛便在浙江嵊泗东南,也算是有点来处的。

剧中重要人物赵匡胤,不必多说,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而知道冯道的人稀少,值得重点说道说道。戏里的冯道是董勇饰演的,相当不错,记得他在当年热播的《北平无战事》里饰演曾可达。对我来说,那部戏前边还行,后边烂尾了。

冯道这个人太特殊,或者说太厉害,给四个不同朝代的十个皇帝当过宰相或者太师。这些皇帝分别是后唐的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后晋的石敬瑭、石重贵,后汉的刘知远、刘承祐,后周的郭威、柴荣。五代里的四代,冯道不仅经历了,而且还身居高高的庙堂。再补充一句,冯道还做过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太傅。



这样的经历,在《新五代史》作者欧阳修眼里,虽然“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但是“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在《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眼里,虽然“道之履行,都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礼”,“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有褒有贬,贬多。有判有疑,疑多。当代黄仁宇的说法更具代表性。他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谈论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例外吗?并不例外。

在《太平年》第八集里,权臣桑维翰讲“是非万古不易”,而钱弘微的现场理解更是让人震撼。我记不住他的台词,但我觉得他的理解也可以被认作针对冯道这个人物而提出来的。同

时让人想起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对冯道来说存民是首要的。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解释。而这对熟悉儒家经典的欧阳修来说依旧是颠覆性的。

第十集的桑维翰之死令人唏嘘。这便是剧集与史书不同之处,史书冰冷而严谨,讲了大道理,其余讲不讲可有可无。而剧集却有血有肉,尤其温度,近之若烘烤,远之会挂怀,让人忍不住设身处地,百般琢磨多思之绳索。此时此刻又怎能偏讲道理呢?

而历史情境尤需深思。比如石敬瑭的“儿皇帝之讥”就是从当时的民族角度言说的。石敬瑭遵奉的辽国主要民族是契丹族。石敬瑭本人亦非汉族,而是沙陀族(史谓西突厥别部),即京剧《珠帘寨》所谓之“沙陀国”。后唐和后汉的执政者也是沙陀族。残暴不仁的后晋叛将张彦泽也非汉族,而是突厥族。即便背景如左,葛剑

雄仍旧认为冯道“采取的是实用态度,与卖国贼石敬瑭还是有根本区别的”。正如剧中人所说,乱世之中谁能分得清胡人汉人?也正因为如此乱世,才令兆民更加向往治世光景和太平年月。

为了《太平年》,我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五代十国部分找出来查看,看看东京开封府东面的地理环境是怎么样的,再看看从吴越国去晋国从海路走会从哪里上岸。这本地图集是葛剑雄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谭对葛说:“欧阳修对冯道的评价是不公的,还是《旧五代史》说得全面,只看《新五代史》是要上当的。”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然,以我的历史学程度,兼听偏听都谈不上。我只是借着看电视的机会,尽力触摸一下历史痕迹,增加点儿历史知识也是好的,比如,从唐朝到宋朝,看起来隔着漫长的五代十国,其实只有五十三年,很短的。

主编:文天心  
责编:于晓琳  
执编/版式:石琪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hljrbte@163.com

## 鉴赏与评论

## 陶马背后的凤林古城

□陈晓媛

在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藏品中,有一匹巴掌大的陶马。它没有秦汉陶马那样张扬奔放的气势,却自带一种古朴克制的力量,把我们带入三江平原两千年前边陲汉魏文明的牧歌与烽烟中。

这匹陶马出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境内的凤林古城遗址。当我们仔细观察它,历史的细节便穿越时空,缓缓浮现。它残长仅12.2厘米,宽3.1厘米,残高6.5厘米,属于典型的夹砂黑褐陶。夹砂陶就是在泥里掺入细砂,让胎体更结实、耐火,常见于北方手制陶。马的面部虽已残缺,但双耳依然警觉地上竖;脖颈以一道流畅的弧线斜上弯曲,显出昂扬之态;鬃毛齐整、脊背平直,展现出制作者对马匹形态的准确捕捉。它的腹腔是中空的,原本应有四腿的位置,只留下四个小小的戳孔。考古学者推测,当年的制作者可能把小木棍插入孔中,作为可替换的马腿;或是为了便于固定在底座上,用于仪式摆放。也正因为这种“留白”,它反而多了一层模型化的仪式感——仿佛随时可以被“装配”并赋予行动。

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背上的高鞍及颈胸躯干的“覆盖感”,从形态特征加以推断,这更像是给马穿了“护具”。这种给战马加装护甲的装备,在考古与军事史里常被概括为“具装”体系。马颈、前胸、躯干等关键部位所表现的凸起与覆盖感,可以被解读为“鸡颈”(保护马颈的甲片)、“当胸”(保护马胸的甲片)和“身甲”。因此它更接近鞍马或战马模型,而非普通役马。这种“具装鞍马”形制在更晚期的北朝骑兵中更常见,而凤林陶马呈现的是核心要素相似、细节更简化的地方化表达方式。

这匹陶马并非孤例。在凤林古城,考古工作者共发现了12件陶马,材质涵盖夹砂陶与泥质陶,颜色有黑灰、黄褐、红褐、灰褐多

谁是谁座宏伟古城的建造者和主人?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共同将答案指向了一个彪悍的民族——挹婁。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等史籍记载,挹婁是肃慎的后裔,后来演变为勿吉、靺鞨,与历史上的女真族乃至今天的满族有着深远的渊源。他们“处山林之间,土气极寒”,以农业、畜牧和渔猎为生,尤其以“善射”、勇猛剽悍著称。

凤林古城及整个七星河汉魏遗址群的惊人发现,为文献中简略的记载填充了血肉。陶马、马具、陶器、铁器,以及复杂的城防建筑,共同描绘出一幅图景:早在两千年前,挹婁人已经在北方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创造了兼具农耕、畜牧、渔猎的复合型经济模式,建立了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并掌握高超的筑城技术和手工艺水平,具备了早期文明国家建制的规模。

马匹在古代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它不仅是社会财富,还是军事力量的体现。陶马所模仿的具装鞍马形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原和辽西地区。在汉魏时期,特别是东汉末年及魏晋,中原战乱频繁,人口与技术向四周辐射。凤林陶马的出现,很可能意味着挹婁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接触并吸收了中原先进的骑兵装备文化。这匹小小的陶马,不仅是挹婁文明进阶状态的一个微缩而有力的折射,更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互动交融的宏大进程。

史书强调挹婁人“便乘船”“勇力善射”。但这匹陶马及其伴出土的马具多类实物材料相互印证,并提供新的旁证:挹婁人同样“善乘马”。在距今约1800至2000年前的东汉至魏晋时期,生活在三江平原的古代先民,已经熟练地驯养、役使马匹,并很可能已出现与武装冲突相关的骑乘与军用需求。他们不仅是江河的女儿,也是草原与平原的驾驭者。这种多元的生计方式,正是先民能够在严酷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基础。

长久以来,“北大荒”在公众印象中是一片“亘古荒原,人迹罕至”的苦寒之地,其大规模开发史似乎只能从近代“屯垦戍边”算起。凤林古城的横空出世,以其占地广阔、规划严整的城址,丰富的出土器物,以及像陶马这样具有文化指向性的遗物,提示我们关于“北大荒”的刻板印象需要被重新校正。早在两千年前,这里已经燃起了文明的星火,古代先民们用智慧和汗水,谱写了这片土地的一部开拓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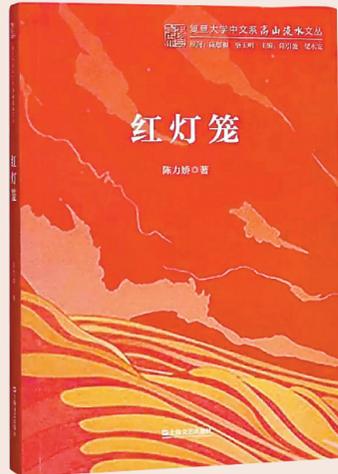
凤林古城与隔七星河相望的炮台山古城“七星祭坛”遗址,南北二者结合,是一座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据此提出凤林古城为“亘古荒原第一都”的说法。中央电视台特别录制了纪录片《凤林古城发现记》对古城遗址进行详细梳理与解读。2001年,两处遗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象征东北边疆古老文明的重要见证。

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课题(科普专项)《黑龙江流域古陶文化价值转化及科普传播路径研究》(SKPJ202559)与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黑龙江流域古陶艺术价值挖掘与文旅融合创新路径研究》(2025A005)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对这件陶马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梳理与解读,让沉睡千年的边疆文明得以重新被看见、被读懂。

当我们再次凝视这匹凤林陶马,它已不再是一块冰冷的残陶。它的身躯里,回荡着战马的嘶鸣与邑落的号角;它的鞍具上,承载着文明的交流与权力的重量;它那缺失的双腿插入的大地下,深埋着一个强大古国的辉煌记忆。它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北大荒”被风雪掩埋的过往;它是一个坐标,标记了中华文明绚烂多姿的图谱;它更是一部无字史书,铭记着挹婁先民的不朽功绩。在生肖马年谈论这件陶器,我们谈论的不仅是马,更是历史的深度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 风雪中的摇曳的人性光辉

□边瑾



《红灯笼》/陈力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到庆华厂走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女作家陈力娇写的《红灯笼》。它是全国第一本以北安庆华工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饱蘸着历史的光泽,是庆华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她来北安采访时,由我陪同,这部书的样书,我也得以先睹为快。

在《红灯笼》中,陈力娇以荒诞又兼具浪漫的笔触,勾勒出乔米朵与李兰君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她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佼佼者,更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与灵魂。倘若没有她们对事业的忠诚、对生死的无畏,便不会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更不会让读者心生感动,陷入深思。

主人公乔米朵的人物形象,于悲感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是那个时代里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她命运多舛,人生是沉重而扭曲的。遭遇家暴,饱受女儿失踪的折磨,历经谋杀丈夫的煎熬,又深陷拖欠公款泥沼,生活始终被绝望笼罩。但这些厄运,没能挡住乔米朵的脚步,在与无边黑暗的抗争中,她最终走出了混沌的岁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

另一位主人公李兰君的人生,交织着幸与不幸。她是一位集美貌、才气与侠气于一身,有着英雄气质的女性。她追求女性人格的独立,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更秉持着正直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因身份特殊,她投身于新型无声手枪的秘密研制工作。

每个人心里都有膜拜的偶像,这是任谁都无法替代的。乔米朵的追求是找到活下去的路,她一直苦苦找不到方向。当发现李兰君的事业伟大时,她的天地一下子变宽了,生命有了质的飞跃。她忽而发现,原来还有比活着更有意义的人间大事。

《红灯笼》准确地把握了家庭与社会联结,托举出群体形象,互为牵手,构成了一部人生大戏。书中的人物,谁都离不开谁,却又在不经意间,成为彼此的救赎或劫难。但如果作品的表达仅局限在这里,也只能说足够犀利深刻,可接下来作者

笔锋反转,为读者拨开乌云,透出一缕阳光——冯家老参与文英二人的登场,让故事增加了温度。

这对父女,用行动诠释着爱与善良,完成了属于他们的使命。冯家老爹一辈子以打猎为生,睿智勇敢,在自己漫长的狩猎生涯中,能从野兽的一举一动中,悟出诸多人与自然的哲理。当他谈起生死,评论善恶,阐述人与兽和谐共生时,每一个论断都充满了智慧与精辟,透出灼人醒世的光辉。

文英也做着与众不同的人性善举,她的命运没有大起大落,平日里看似温和淡然,却毅然收养了乔米朵不愿认领的盲孩子。在李兰君离世前,她更是展现出超越性别的果敢与勇气,坚定地李兰君说:“放心走吧,国家会记住你的功勋。”文英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小说中最温暖、最厚重的篇章。

作为黑土文化的叙述者与文学传承的守望者,陈力娇从没有忘记把东北地域的自然风貌融于笔下。在《红灯笼》中,她不惜笔墨刻画了“小狼奶白”这一形象。它是一头狼,却通人性,知善恶。它甘愿放弃与父母返回大青山的机会,坚定地留在人间,只为能日日陪伴乔米朵的孩子冯松花。

陈力娇通过狼与人的微妙平衡,展现生态伦理的复杂性。写作方法延续了她的“从土地中生长的文学意识”,使动物承载了一方水土人情的集体记忆,也寄托了一代人的历史反思。与同类作品相比,作者避免了过多对自然的浪漫化渲染,让作品在钢铁森林的叙事背景中,多一抹曙色,多一缕希望之光。

《红灯笼》讲述的是我身边的人和事,读罢心头仿佛升起了一盏温暖的灯笼,悄声地呼唤自己,去注目风雪中慢慢远去的历史背影。恍惚间,我仿佛看见,那些兵工战士们,在风雪弥漫中又一次来临了故土。



陶马  
早期铁器时代 友谊凤林城址

种,均为手工控制,风格写实而古朴。与它们一同问世的,还有两件小巧的夹砂黑褐陶马鞍模型,前桥高直,后桥略矮后倾,形态逼真。古城遗址中还出土了马的骨骼,以及铜铃、铜节(连接皮条的构件)、铁马镫甲片等马具配件。

陶马出土地凤林古城位于三江平原南缘、七星河中游北岸,背倚绵延的完达山脉,面向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可谓依山傍水,进退有据。考古发掘揭示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城池。其城墙高大,护城壕深邃,防御体系极其严密,城内功能区清晰。目前,它在整个三江平原地区汉魏时期城址考古发现中,规模与等级都相当突出。学术界普遍认为,凤林古城极有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王国”或强大部落联盟的权力中心。



请关注龙头新闻APP  
文旅频道·妙赏专栏